

齐鲁人文

政德镜鉴

在地方，他是视灾民若赤子的救护人；在朝堂，他是勇批逆鳞的敢言者；在江湖，他是为老友鸣冤奔走的知心人。

他用一生行迹，诠释了何谓“仁厚忠义”。

马经纶：视民若赤子，忠义护李贽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本报通讯员 周倩倩

在梁山县莲台寺内，有一块刊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（公元1595年）的一块石碑。碑文记载了曾任肥城知县的马经纶无私救助梁山灾民的仁义之举。

马经纶在肥城任职，政绩斐然，百姓感念。当其离任后，梁山百姓刻石勒碑，将其事迹流传后世。而马经纶在愤然辞官后，更冒雪行进三千里，到达湖北救助一位不为世俗所容的大思想家——李贽。

马经纶常为受屈者鸣冤，在朝堂有“忠义”之誉。因感其宽厚忠义，晚明文学家袁宏道在《李温陵传》中一再尊称他为“马公”，文字中处处流露敬重之意。

“凡民皆赤子也”

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（公元1562年），马经纶出生于顺天通州（今北京通州）。据史载，他少时聪明好学，17岁即为州庠生。万历十三年，马经纶考中顺天乡试举人，四年后考中进士，名列三甲同进士。

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数。明末思想家李贽和该榜进士中的两人成为人生不同时期的挚友。

其中一位是该榜状元、时任49岁的焦竑，他是李贽早年的知交。但在中状元后，焦竑却刻意与“不合世俗”的李贽拉开了距离。而此时年仅27岁的马经纶，后来成为李贽暮年的唯一依靠。

不过此时的马经纶，虽仰慕李贽学说，却还没有机会与他相识。中进士后，马经纶先在工部观政实习。后来实习期满，因为进士名次靠后，经过吏部铨选，他被外放到山东肥城任知县。

马经纶虽无施政经验，却有爱民之心。他接到吏部任命书后出发，行囊中最重要的乃是一本《仁赠编》。这是历代贤达关于治理百姓的言论合集，马经纶把它当作官指南。

为了减轻百姓负担，马经纶以有偿招募来代替强制徭役，以县库赋税盈余来抵偿应缴税款。他还兴办教育，创建“至道书院”，教授并考查士民。为了保一方平安，马经纶组织民众将县城土城改为石头城。

马经纶在任期间，山东一带发生大旱。先是盛夏不雨，接着入秋亦不雨，河道断流，禾苗干枯。庄稼几乎颗粒不收，百姓只能觅草根



梁山莲台寺内，有一座梁山百姓为纪念马经纶而镌刻的石碑

树皮度日。当时肥城县“流人焦土，饥馑荐臻”。马经纶预先作了防备，对于饥寒交迫的百姓“自煮粥处或给粟，或赐钱”。为了防止产妇因为缺粮遗弃孩子，马经纶还特意“给之月米”，改善她们的生活。在他“寒者衣之，病者药之，死者棺之”的救助下，肥城虽然遭灾，百姓却依然有果腹之粮。当时百姓赞叹道：“古之救荒无奇策，奇莫于斯矣。”

邻近的梁山县灾情也重，物资奇缺，百姓遭受灭顶之灾。至第二年春，当地炊烟断绝，几乎十室九空。朝廷虽然下发诏书要求地方官煮粥赈济，但多数州县行动缓慢，大批百姓在存亡之间挣扎。

在肥城做过的梁山百姓，看到这里虽遇灾荒而无饥馑，便将讯息传递于家人。梁山三四百难民无计可施之下，长途跋涉来到肥城乞讨求生。马经纶“不计管辖与否”，“凡民皆赤子也”，对梁山难民一视同仁。梁山灾民到了肥城，有吃有穿。两个月内，“枵腹者充体，羸者壮”。麦秋时节返乡的，马经纶又“给之米钱以充道费”，“梁山赖以全活者不止三四百”。

大灾过后，梁山灾民回到家乡，逢人便言：“吾辈得有今日，回其故乡，享父母妻孥之乐，生齿烟息而成立者，谁所赐乎？马公共造也。”

万历二十三年，马经纶因政绩显著，升任监察御史。肥城百姓挺竖奋土，负木曳石，为马经纶建起生祠。梁山百姓知晓后，也奔走相告，捐资刻石，永远记录马经纶的恩德。在这块名为“肥城侯马公活命碑记”的石碑末尾，百姓们情真意切称赞说：“嘻，大地之心，生物之心也；帝王之德，好生之德也。公具体大地生物之心，薄帝王好生之德乎！”

言官有五罪，其过在帝王

六年的肥城知县经历，增加了马经纶对基层疾苦的了解，深化了他对朝政积弊的认识。赴任时，他还是未及而立岁的年轻人；离任时，他已是洞见深刻的思索者。

马经纶思索的，是什么造成了国计之艰、民生之难。随着思考的深入，他渐渐将矛头对准庙堂，对准那个多年不上朝，置百官群僚、天下苍生于不顾的万历帝。

很快，他就和皇帝发生了激烈交锋。马经纶上任的当年冬季，兵部开始考核地方军政成绩优劣。万历帝认为地方军队有官员

头衔不合朝廷规章制度，就斥责兵部大臣徇私舞弊、兵科言官没有及时弹劾。在轻罚兵部官员之后，万历帝矛头一转，将34名监察御史或贬官边疆或降职罚俸。奇怪的是，万历帝虽然严厉责罚言官，却始终不愿拿出证明御史失职的证据。

万历帝带有明显个人情绪的行为，令朝廷百官惊恐不已。

不久，东厂太监张诚触怒了皇帝，进而牵连到张诚家奴锦衣副千户霍文炳。他本应提升为指挥金事，兵部大臣也提前奏请了朝廷，在程序上并无明显瑕疵。但皇帝认为这是兵部为讨好太监张诚而徇私举荐，言官没有尽好弹劾的职责，于是此事也被皇帝用来当作打击言官的武器。皇帝移怒于两京（北京、南京）的科道言官，认为他们故意保持沉默，没有履行好监察职责。他下令将各科掌印给事中全都贬降三级。于是十九名给事中被调任外地，留在两京的也全部停发一年薪俸。

面对皇帝的“蛮不讲理”，内阁大学士赵志皋、陈于陛、沈一贯和九卿官员先后上疏抗议，兵部尚书石星也请求辞职来安慰各臣，皇帝却全部不采纳。后来，皇帝干脆准备将这些言官全部降为闲职。吏部尚书孙丕扬再次上疏乞求皇帝宽恕众人。皇帝更加愤怒，竟然将这些人都剥夺官职贬为平民。

马经纶见万历帝将朝政视作儿戏，把百官当作玩物，满怀愤慨地写成奏疏，对皇帝言行予以辛辣批判。

在奏疏中，马经纶回顾了此事原委，并陈述自己上疏缘由：“顷屢奉严旨，斥逐南北言官。臣幸蒙恩，罪供伏罪，今日乃臣谏诤之日矣。”说完这些“客套话”后，马经纶单刀直入，列举万历帝多年来的种种不作为，“陛下数年以来，深居静摄，君臣道否，中外俱抱隐忧”。

马经纶认为，皇帝平时荒唐朝政，朝廷却能照常运转，靠的是百官勤勉和言官监督。百官是朝廷股肱，言官则是朝廷耳目。如今皇帝无端责罚言官，无异于涂抹自己耳目，朝政岂能清明？

马经纶对皇帝处置官员的措施提出异议。他认为如果兵部考察官员失当，责罚兵部和兵科言官即可，不应波及及其他御史。他还质问皇帝，此前皇帝动辄为言官加上“乱言”罪名，如今又以“不言”责罚，言官只能百口莫辩。说完这些，马经纶提出言官有“五条罪状”，其实每一条都是讽刺万历帝的“怠政”：

陛下多年不郊祭上天，言官不曾援引典故直言进谏，这是让陛下陷于不敬上天的窘境，其罪一也；陛下多年不祭祀祖先，言官不曾及时批鳞进谏，这是让陛下不敬祖先，其罪二也；陛下疏远百官，荒唐朝政，言官虽有规劝却无法坚持到底，这是让陛下不能效法祖宗勤政，其罪三也；陛下不能远离奸邪之人，不能任用贤能之人，言官无法让陛下改过从新，这是让陛下不能仿效祖宗任用贤能，其罪四也；陛下“好货成癖，御下少恩”，宫廷之内怨气滔天，恐怕即将生变。言官虽然忧心忡忡，却没有勇气冒犯劝阻陛下，这让陛下忘却登基初衷，无法善始善终，其罪五也。

列举完五条罪过，马经纶认为：陛下如果肯用这五条罪罚言官，岂不是更为恰当？既然如此，为何要责怪他们缄默不语呢？

“陛下独不思为社稷计乎”

马经纶越说越激愤，开始严厉批评万历帝的行事作风。廷臣也轮番上疏，皇帝不但不肯纳谏，反而将言官落职为民。马经纶认为，言官本就出自民间，现在让他们再度成为平民，只是回到人生原点，又有什么遗憾呢？自己只是担心皇帝轻蔑内阁奏疏，辅臣还有什么尊严？皇帝不屑各部奏疏，九卿又有什么尊严？如此无法度地行事，只会伤害自己的股肱心腹。马经纶接着将君臣比作一个人，认为即使君主是英明的头脑，也需要依靠股肱心腹耳目

的帮助，才能行动自如。现在皇帝“自塞其耳目，自离其腹心，自戕其股肱”，以后还能和谁一起治理天下？

奏疏最后，马经纶给万历帝敲响警钟。他认为君主受命于天，就如同人臣受命于君，两者道理是一致的。如今言官没有什么大罪，君主却凭借情绪来随意处置他们。如此行事，既大失人心，又上拂天意。平时陛下不郊不帝、不朝不讲、不惜才、不贱货，处处违背人君之职。万一哪一天上天震怒，降下非常之灾，那时皇帝能否违抗天命呢？马经纶警告万历帝：“臣不能抗君，君不能抗天，此理明甚，陛下独不思为社稷计乎？”

这篇言辞激越的奏疏呈递后，看得万历帝火冒三丈。尤其是马经纶总结的御史“五条罪状”，更让他怒不可遏。万历帝大怒，将他贬官三级，派往外地。

马经纶奏疏在朝堂引起强烈反响。他被贬官后，工科给事中林熙春等人联名上疏，认为万历帝此前因言官缄默而发怒，如今又因言官谏言而贬斥，“令臣等安所适从哉”？他们认为马经纶对朝政慷慨陈词，却遭到不公正待遇，“恐庙堂之上，率诤佞取容”。朝堂如此局面，“非君上之福也”。

奏疏呈递后，万历帝更加生气，不仅将上疏之人贬官，还追加对马经纶的惩罚，将其贬为典史。

后来，南京御史林培继续上疏为马经纶鸣冤叫屈。皇帝再度追怒马经纶，直接将他罢官为民。马经纶对朝政心灰意冷，回乡杜门谢客十年。

赴麻城营救李贽

无官一身轻，马经纶在家乡建设义学，救助贫民，研读经籍，生活倒是过得颇为自在。随着研习日深，他对李贽那些“离经叛道”的思想越来越向往。在朝堂“伪善之学”的笼罩下，李贽学说散发着迷人魅力。

恰在此时，马经纶听说年逾古稀的李贽在湖广遭受众人非难，甚至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。

当时李贽在湖北麻城一带讲学。他教授学问不问出身性别，故而三教九流、男女老少皆可来听讲问道。一时间，和尚、樵夫、农民，甚至女子也推开门帘前来。麻城几乎满城空巷，李贽在这里大受欢迎。

但学徒中出现女性身影，扰乱了“男女大防”的传统观念，这在当地士绅眼中是断难接受的。他们散播李贽会妖术、勾引妇女的谣言，煽动普通百姓围攻李贽。到了最后，李贽不仅在当地备受排挤，连自己准备死后安葬的寺庙也被烧掉了。

李贽原来的朋友很多，如“公安派”的三袁（晚明文学家袁宗道、袁宏道、袁中道）、状元焦竑、会元陶望龄、总督刘东星、梅国桢、汪可受、顾宪谦等人。但此时，这些朋友或因病亡故或因自保而疏远，导致古稀老人李贽孤苦无依，随时有丧命之虞。

马经纶决定前去营救李贽。他从北京出发，冒雪三千里来到麻城。他给当地官员和士绅写信，怒斥他们的丑恶行径，为李贽及其学说辩护。他还向李贽表达了自己的仰慕之情，并邀请他和自己同去武昌避难。马经纶准备在那里购置房屋地，两人一道不问世事、研究学问。

马经纶的真诚深深打动了李贽。但因为湖北官府的阻拦，武昌之行未能如愿。马经纶征得李贽同意后，带着他跋山涉水北上通州。在马经纶家中，李贽完成了自己的著作《九正易因》。也许自感时日无多，李贽常对马经纶言道：“我得《九正易因》，死快矣。”

未想，一语竟然成谶，灾祸很快降临。

暮年知心友，忠义满乾坤

马经纶没有想到，相较麻城，道学家在京



晚明思想家李贽像

师的势力更加深厚。他们对李贽的怨恨和恐惧，也更甚于麻城士绅。

李贽学说因其离经叛道、新鲜直爽，很早就闻名于全国。许多书商看中了李贽著作的经济利益，竞相盗刻刊印他的著作，使其思想更加盛行。

李贽学说迅速传播，引起了朝廷的紧张。御史张问达等人上疏，检举李贽刻《藏书》《焚书》等作品“流行海内，惑乱人心”。他还指责李贽思想违背程朱理学，“以吕不韦、李园为智谋，以李斯为才力，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，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”。

从张问达为官事迹看，他并非昏庸奸邪的官员，他攻击李贽更多源自学术信仰的异同。

万历帝同意了张问达的奏疏，下令立即逮捕李贽，并焚烧李贽所有著述。

官差很快到了通州，马府上下陷入一片喧哗。病榻上的李贽很快知道了自己的命运，他立即起身，走了几步却瘫倒在地，随即大声说：“是为我，为我取门片来！”马家仆人送来了门片，李贽躺上面，疾呼曰：“速行！我罪人也，不宜留。”

李贽此举，是为避免牵连到马经纶。但马经纶挡住官差，一再表示愿意跟随李贽前往。李贽对他说：“逐臣（马经纶曾因上疏而被罢官）不入城，制也。且君有老父在。”马经纶则说：“朝廷以先生为妖人，我藏妖人者也。死则俱死耳。终不令先生往而己独留。”最终，李贽无奈同意马经纶同行。

到了通州城外，马经纶的知交、家仆共十余人前来挽留，甚至到了泣不成声的地步。马经纶始终不为所动，坚持与李贽偕行。

次日，官员开始审讯李贽。忧心如焚的马经纶给朝中曾有交往的官员写信求援，他在信中阐明李贽学说的独特价值，厘清世人对他的种种误解，恳请朝廷为一位古稀老者留一条生路。可惜因为他结交的官员大多职位低微，所以事件始终没有多大转机。马经纶所写的求救信件，多收入李贽《李氏遗书》中，至今读来，犹觉情感真挚，令人动容。

正当马经纶多方求援之时，朝廷开始了对李贽的轮番审讯。面对主审官“何以妄著书”的责难，李贽因病躺倒在地，气喘吁吁曰：“罪人著书甚多，具（俱）在，于圣教有益无损。”多番审讯下来，朝廷得不到李贽传播淫邪思想的确凿“罪证”。李贽在狱中则读诗书自如，精神没有丝毫懈怠。

最终，朝廷决定将李贽遣送回原籍。76岁的李贽来到通州，早有埋骨此间的想法，所以他早年在马经纶家中已叮咛好友自己的身后事。如今听说朝廷要遣送自己回乡，李贽不禁万念俱灰，萌生死意。一日，他呼侍者前来剃发，侍者走开的间隙，他突然持刀自割其喉。但因刀具不够锋利，李贽竟然“气不绝者两日”。旁人问其自刎之故，李贽用手写字曰：“七十老翁何所求？”两日之后，李贽痛苦去世。马经纶听说后，悲苦万分，曰：“吾护持不谨，以致于斯也。伤哉！”马经纶立即“归其骸于通（州），为之大治家墓”。

四年后，年仅43岁的马经纶因长久痛苦而病故。他去世后，肥城百姓多去吊唁。梁山百姓知道后，也为之悲痛不已。后来，通州百姓将其奉祀在文庙贤祠。天启初年（公元1621年），朝廷恢复了马经纶官职，并追赠他为太仆少卿。

齐鲁名士

对于如何治水，贺长龄提出“以导为主”的方针：“期其水有归宿，必先去路疏通”“是以疏导去路，实为决壅之先机”。

贺长龄：经世思想中的“山东经验”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湖南长沙人贺长龄是道光年间的经世能臣。在他的支持和帮助下，思想家魏源得以汇总各种资料，编纂成皇皇巨著《皇朝经世文编》。

贺长龄的经世思想，源于他在治理地方中积攒的丰富经验，而山东任职时期更是他思想趋于成熟的关键节点。

1822年7月，37岁的贺长龄因在江西南昌府任上政绩突出，被时任两江总督、山东济宁人孙玉庭举荐，“南昌府知府贺长龄尤为才识优长、持论公正、皆有根柢、洵堪委任之员”。因此，贺长龄被提升为山东东沂曹济道。

清代中期以后，山东人口迅速增长，人地矛盾日益突出。与此同时，山东水旱灾害频繁，灾荒饥馑不断出现。为了保障全省农业生

产，水利建设尤其关键。贺长龄在任期间“重实经世”，极其重视当地水利建设。他一到任，就关注到“（山）东省连年被水，而今岁尤甚，本道虽甫经莅任，而蒿目困苦，深惻于怀”而且当地百姓困于小利，“不肯舍此尽寸之土，以为疏通水道之地”。不少百姓甚至“往往私行侵占，开垦播种，以致愈愈壅塞”。因此，他迅速发布《劝民开沟除潦示》。随着对当地情况了解深入，贺长龄的水利建设思想也日趋成熟。在他后来所撰《查勘东兖曹济各属水利详》中，明确指出人为因素是水灾旱灾频发的祸首：“夫早潦有备，三农所重，患潦之地，每多患旱，因属天道之盈虚，而潦不能除旱，则实由人事之未尽。”在任期间，贺长龄开沟泄，兴水利，百姓收获倍增。

对于如何治水，贺长龄提出“以导为主”

的方针：“期其水有归宿，必先去路疏通”“是以疏导去路，实为决壅之先机”。因此，他饬令地方官敦促农民开沟除潦，“夫水之物能用则为利，不能用则为害，今各县地方潦则一片汪洋，旱则赤地千里，盖因泄水无方而蓄水无术，不能得其利，是以兴修水利最为务”。

与此同时，贺长龄深刻认识到当地水利建设与运河、漕运关系密切，并注意到漕粮河运存在的壅塞问题，“司此土者，岂无筹及于是，而往往议而不行，及行而复阻者，固由于愚民灾害阻挠，而实由于运河之窒碍，盖运河浮送空重，漕船攸关国计，河水之盈细漕运速系焉”。后来，贺长龄还参与并主导漕粮海运，帮助朝廷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大运河的依赖。

由于贺长龄防汛出色，在1824年调任广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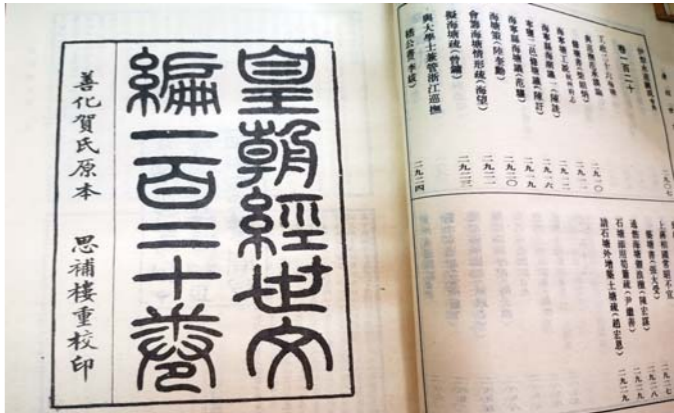
按察使时，时任山东巡抚琦善奏留他继续留任山东，得到道光帝应允。当年9月，贺长龄被擢升为江苏按察使，并经河督严烺保奏，贺长龄因防汛有功“著加恩交部议叙”。

在山东任上，贺长龄四处搜罗，积攒了许多经世致用的文章。道光五年（公元1825年），因公务繁忙，他聘请思想家魏源作为幕僚，帮助自己编辑这些文稿，最终成书《皇朝经世文编》。

1827年初，道光帝调贺长龄回任山东布政使，后署理山东巡抚。临行前，他嘱托魏源帮助完成自己两大心愿：一、

向著名文人包世臣请教，“代询（山）东省治要”；二、请求魏源代自己刊刻《皇朝经世文编》。

不久，《皇朝经世文编》终于刊成，其书凡120卷，文章2236篇。全书分学术、治体、吏政、户政、礼政、兵政、刑政、工政八类，类下又分子目。其选辑清初至道光前官方文书、专著、述论、奏疏、书札等文献，反映了部分学者和官吏“经世致用”思想及改革图治愿望。此书行世后，开启了近代经世思潮，续书争出。



贺长龄、魏源主编的《皇朝经世文编》

鲍青 摄